

# 魏晋风度与道家思想的传承研究

陈登平

(三明学院 初教系,福建 三明 365004)

**摘要:**本文就魏晋风度与道家思想的传承关系进行了探讨,分析了道家思想重新崛起的原因、儒道本义、魏晋风度的特征及其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阐发的关系。

**关键词:**魏晋风度;道家思想;传承;自觉

**中图分类号:**B235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5831(2004)06-0058-03

千百年来,中国是一个提倡儒家思想的国度,但在历史上的某些年代,道家思想曾占据了社会的主导地位——魏晋时代便是典型的例证。虽然在西汉的汉武帝时期已经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使得儒家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但到了汉末道家思想又重新崛起,议论争辩的风气相当盛行。正是在此基础上,与颂功德、讲实用的两汉经学相区别,一种真正思辨的、理性的“纯”哲学产生了,并进而促成了魏晋时代人的自觉。

## 一、汉末魏晋道家思想的重新崛起

汉初,黄老道家思想曾盛极一时,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道家便失去了原有的优势和地位,但并没有从历史舞台上消失,它作为一股暗流,始终在汉代社会里涌动,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着。到了汉末,随着大一统王朝的衰微,中央集权对人们思想的控制与影响也日渐衰微。社会变迁在意识形态和文化心理上的表现,是占据统治地位的两汉经学的崩溃,及至曹魏时期,道家思想开始从复兴中的诸子之学中脱颖而出,并逐步成为魏晋时期的主流思想,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的复兴,既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必然,也是那个时代的文人们对生存方式的重新选择,对个体人格的重新塑造。曹魏崛起以后,一批提倡老子道德论的知名学者汇集于曹氏父子麾下,夏侯玄、荀粲、钟会、管辂、裴徽、刘劭是其中的主要人物。道家思想复兴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第一,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在中国封建社会,由大

乱之世转为大治都必须经过一个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过程。西汉初年盛行的黄老思想,就是这种历史要求在理论上的反映。东汉初,光武“以柔道治天下”,实际也是一种黄老思想。汉末魏晋时期全国动荡不安,也同样需要黄老思想来理顺各种关系,巩固国家政权。

第二,在政治思想领域,经过实践的检验和历史的筛选,黄老思想也确实显示了它的优越性。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曾经指出,当时的法家、名家、儒家、墨家、杂家、各有所得,也各有所失,只有道家才能做到“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既高于各家,又不遗漏各家的长处。王弼的这个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第三,从士人阶层这一角度来看,一方面,士人与政权的疏远使他们由忠君忧道开始趋向自我,追求个体生命存在的价值;另一方面,士人冲破儒家经学的长期禁锢后,需要有一种适合当时状况的思想观念作为支撑。士人的这种现实需求正好与道家思想观念找到了契合点。从儒家思想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士人们,面对惨痛的现实,感到人生的无常,他们渴望能抓住或延长这短暂的人生,在这生命的瞬间追求生存价值的永恒。道家的“任自然”、“养生”、“全身”、“重情”之说正符合了他们的心理,于是为士人所接受。

## 二、儒道本义与魏晋风度

以上探讨的是汉末魏晋道家思想重新崛起的因由,接下来探讨儒道的本义究竟区别在哪里,它们又如何影响了魏晋时代的士人们。事实上,这一时代注重道家思想,并不是说这一时代完全抛弃了儒家思

想,而是把儒家思想融到了道家思想之中。王弼就是这一时代之集大成者,《三国志》称王弼“好论儒道”,即合儒家之书,如《周易》、《论语》与道家之老、庄并论。那么,儒道的本义究竟有无区别?老子五千文中,反复说“无”,所谓“无”,非一切皆无,实一切皆有,何宴《无名论》云:“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则夫无名者,可以言有名矣,无誉者可以言有誉矣,此比于无所有;故皆有所有矣。”儒家之根本义为“中”,孔子说“中庸其至矣乎”,《中庸》言“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圣人无情”,是魏晋清谈时所留意的,而为何宴、王弼所首倡。魏晋人醉心于人格之美,最重抒情。喜怒哀乐,情也,《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衍尝丧幼子,山简吊之,衍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衍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于情,然则,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圣人忘情”,正是何宴之说,而“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则为魏晋清谈家自况。就老、庄而论,老子太上忘情,“少私寡欲”、“绝学无忧”(《老子》十九章),庄子虽自谓无情,其实未免于有情,庄子曰:“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孔子固茂于情者,然儒家运情,务在得情之中和,即以理控制情。何宴、王弼之后的嵇康也著《声无哀乐论》,以为哀乐发于情,情动于心,声成于外,所以声音与哀乐无关。在政治思想上,儒本仁,而道本于自然,《老子》曰:“道法自然”,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在实际政治上,儒家政治思想“直而不能曲”,可以守常,难以应变,道家思想容易两极分化,运用得好,国家太平,人民生活安定,运用不好,就会流而为法,主张霸术,可以成功一时,而不能垂教久远。

所以,无论是“无”,还是“自然”,在本质上仍然是对社会生活的干预,道家与儒家所不同的是对这一世俗社会的干预方式不同罢了。魏晋风度便是这一时期人的自觉与道家思想交相融会的产物。一方面,死板的儒家教条在此时处于衰落状态,因此思想上的禁锢松弛了许多,知识分子终于可以以一个独立的人的身份去思悟宇宙、社会和人生的本质与意义。另一方面,严酷的社会现实严重威胁着知识分子的生命,越是清醒就越是会对现实作出深刻的批判,也就越容易遭受杀戮。由此产生了两种貌似对立的生存方式——或是内敛式的玄学思辩,或是激进的佯狂避世,而其中不变的则是知识分子的叛逆性与潇洒性的并存。总之,这是一个反对政教礼教对人的“异化”的时代,这是一个个人存在价值前所未有得到突现的时

代,是一个在喟叹人生无常表面之下强烈渴望实现人生价值的特殊时期。

### 三、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

魏晋风度即魏晋名士风度,它讲求保持人的自然性与生活上的率性而为,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批判思想。够得上称为“风度”的,当有它独特的生活方式,而这一时代士人们的独特生活方式全部保存在《世说新语》中,鲁迅在他著名的演讲稿《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以“药”与“酒”两样东西来概括魏晋名士的生活方式,是相当敏锐的概括。下面简要概括一下它的特征。

论道谈玄 论道谈玄的名士讲风度,有风度的名士应该手握一支麈尾,东晋初年的王导是其中的一位典型人物。主要内容便是儒道,但更多的是谈玄学,故而又称谈玄或玄谈,如论“有”与“无”;既为清谈,当然注重口才与论辩能力,因而《世说新语》中“言语”是列在“德行”之后的第二门的;同时还对当时的人物进行评论。

狂放不羁 以“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为代表。如嵇康在钟会去拜访他时,“箕踞而锻,不为之礼”;同为“竹林七贤”的好友山涛举荐他为官,他立即写了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拒绝云:“一旦迫之,必发狂疾。”最终因为不肯和司马氏合作而被杀害,临刑前旁若无人,弹奏一曲《广陵散》而终。阮籍的著名典故就是一个成语:“青眼有加”。据说他能为“青白眼”,只有嵇康来时才加以青眼,其他人一律白眼相加;司马昭盛排宴席,“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阮咸放荡惊世骇俗,刘伶却放情肆志,甚至在家里会客衣服都不穿。他们还吃药饮酒。吃药,最早是何宴,吃的是“五石散”,鲁迅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就是因为吃药的缘故,其后还有王弼、夏侯玄。“竹林七贤”主要不是吃药而是饮酒,嵇康是喝酒兼服药,而阮籍却是专喝酒的代表,司马昭为儿子向阮籍求通婚,阮籍大醉六十天,不能言可否。醉酒中的竹林七贤代表了玄学初起时的一种人生观念,之后,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文人士族中开始流行,谈玄理、读《老》《庄》、服药饮酒、放浪形骸,不理世事的闲适是他们崇尚的“无为”“自然”境界,但这正体现了他们的“人的自觉”的精神。

山水隐逸 从汉末开始的天下大乱,使得隐逸之风前所未有地兴盛,到东晋时在名士之中已相当普遍。当然投身于山水隐逸的真正目的是各不相同,不管怎样,山水田园成了士大夫生活与心灵不可或缺的

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人与自然还从未这样真正的接近并相互交融过,而人与自然的融会又反过来对人的精神面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歌舞声色** 中国知识份子的这种“风流儒雅”的作风是到魏晋时代才形成的,“琴棋书画”在此时正式成为名士风度与品位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事实上成为了人内心价值自觉表现的寄托物,对歌舞声色的追求,对生活方式的重视,实质是追求精神价值的实现,这和后世的声色犬马、浮靡享乐是有着质的不同。

**超越生死** 关于人生的思考,最沉重、最深刻的莫过于生死问题。在那个战乱频仍、命如草芥的时代里,死神如影相随。因此,在这一时代,除象曹植等一部分人仍然保有一种“戮力上国,流惠下民”思想外,更多的是采用了一种放达的生活方式和及时行乐的思想,甚至于逃向道教与佛教。而庄周对待生死的态度是生死一同,《庄子·至乐》说,庄子的妻子去世,他鼓盆而歌,吊唁的人不明其理,曰“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本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之而死”。庄子的这种行为,在魏晋间最得人心许,死亡犹如归家,生死界限一除,人心顿然彻悟。总之,一切皆是返其所始,生与死都是一股“气”,超越生死,参透生死正是魏晋人从老庄那里学来的对生命的直接观照与感悟。

#### 四、魏晋风度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与阐发

从魏晋风度的主要特征里我们可以看出道家思想对魏晋风度的产生所带来的影响,可以说魏晋风度是直接从道家思想汲取营养,从而形成自己的独特特征的。那么,魏晋名士们又是如何从道家思想里汲取营养的呢?

第一,直接注解老庄。汉末《老子》一书,一方面为张陵、于吉、张角、张鲁所利用,与方术相结合,而成道教之经典;另一方面与佛理儒书相结合,而开魏晋清谈之风。《老子》之有注,实始于马融,直接注解《老子》的还有王弼、钟会、何宴。注解《老子》等道家学说可以使道家思想的流传更加广泛,影响更加深远,而注解之人更是深受影响,从而使黄老思想成为自己的世界观。自此而后,六朝谈士,莫不奉《易》、《老》、《庄》三书为玄典。

第二,在言行上学老庄。前述已经提及,魏晋名

士们的清谈、狂放不羁、隐山水等无一不是从老庄,特别是庄子那里学来的,再加上他们的身份与地位,使得他们的行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日渐深远,成为人们争先效仿的对象。魏晋士人们的吃药饮酒虽说与道教有关,然而道教也是从黄老那继承思想的(他们把老子奉为鼻祖,实际上道教有自己的思想体系),当然我们这里要区别开道教与道家,道家思想是哲学思想,而道教则是宗教。

第三,对道家思想的阐发。他们并不是简单的注解黄老,更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了自我需要的发展,从而形成自己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王弼与张衡对黄老的注解皆各不相同可为明证,王弼注《老子》是“以道证玄”,探讨“有”与“无”,而且王弼又把老庄思想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而张衡则把“玄”扩大为一种宇宙论。东晋时代的著名僧人慧远就以佛教徒的身份解释黄老,把释道儒融合在一起,而陶渊明却是儒道合一。汉末魏晋时代士人们对黄老的继承与阐发,直接导致了汉末魏晋间思想的空前大解放,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特征,用杜牧的诗句“大抵南朝皆旷达,可怜东晋最风流”来概括是再恰当不过了。但也不是没有人批评过这种“风流”,东晋的干宝、葛洪,明清之际的顾炎武都曾痛骂过。无论怎样,魏晋风度的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后世的李白、王维等便颇有魏晋遗风。当然,魏晋风度产生在充满动荡、混乱、灾难、血污的社会和时代,因此,有很多时候是表面看起来潇洒风流,而骨子里却潜藏着、深埋着苦恼与恐惧,甚至于因不与统治者合作,而惨遭杀害,如何宴、嵇康等等……“广陵散于今绝矣”,“华亭鹤唳不可复闻”,留下来的就是这种痛苦悲哀的传闻故事。

#### 参考文献:

- [1] 陆元炽. 老子浅释[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
- [2] 吴中杰. 魏晋风度及其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3] 贺昌群. 魏晋清谈思想初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 [4] 戴燕. 玄意幽远——魏晋玄学风度[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 [5] 李泽厚. 美学三书[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